

人生况味尽如剧

黄允

海上谈艺录

简平 李葭著
上海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编

上海文艺出版集团
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

海上谈艺录丛书

人生况味尽如剧

简平 李葭 著

上海文艺出版集团
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

图书在版目录 (CIP) 数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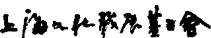
人生况味尽如剧 / 简平, 李葭著. —上海: 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
2009.9

(海上谈艺录)

ISBN 978-7-5452-0501-5

I. ①人… II. ①简… ②李… III. ①黄允 - 评传 IV. ①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9) 第229412号

“海上谈艺录”丛书获  资助

策 划 杨益萍 张晓敏

统 筹 邹 平 王 刚

责任编辑 许 铭

特约编辑 孙建成

封面设计 姜 明

技术编辑 李 荀 孙宗霄

丛 书 名 海上谈艺录

书 名 人生况味尽如剧

著 者 简 平 李 葭

出版发行 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

地 址 上海市长乐路672弄33号 (邮编200040)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上海锦佳装璜印刷发展公司

规 格 787 × 1092 1/16

印 张 11.25

版 次 2010年1月第1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52-0501-5/J.297

定 价 28.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装单位联系 021-56401314

版权所有 不得翻印

目 录

艺术访谈

时代和生活的馈赠	(003)
----------------	-------

艺术传评

第一章	孩提时光	(017)
第二章	地下“少共”	(026)
第三章	初涉广电	(035)
第四章	边乡足迹	(043)
第五章	一鸣惊人	(055)
第六章	求索艺术	(065)
第七章	钟情弄堂	(084)
第八章	交流之旅	(094)
第九章	“上海经典”	(106)
第十章	再攀高峰	(121)
第十一章	知音如春	(134)
第十二章	感恩生活	(142)

附 录

从艺大事记	(159)
后 记	(167)

艺术访谈



我希望自己的电视剧作能揭示人的内心世界，把人人都能见到、听到，或者亲身经历过，或者潜意识中存在过，却又没有在意的东西提炼出来，再通过电视荧屏展现在人们面前，使人们产生联想、感悟，产生激动、共鸣，重新审视自己。这就是我的艺术追求。

——黄允



黄允在自家客厅

时代和生活的馈赠

时间 · 2009年盛夏

地点 · 上海淮海西路

被采访人 · 黄允

采访人 · 简平 李葭

2009年。

盛夏。

午后。

我们如约来到闹中取静的上海市淮海西路。

黄允的家就在这里。

门铃刚按下，就听到门内一声清脆的“来了——”，接着，门便打开了。

黄允亲自来开的门。

这位著名的女剧作家热情地把我们领进了屋里。

黄允身材瘦瘦小小的，但精神矍铄，一点也看不出是年逾古稀的人。

黄允穿着棕色小碎花的套裙，精致而典雅。最让人过目不忘的是黄允的一双眼睛，里面没有一点点这个年龄段老人的迷离和浑浊，相反，却是乌黑清澈，炯炯有神。正是这双眼睛洞察到了世上的冷暖人情，捕捉到了人间的悲欢离合，再加上心灵的感悟和体恤，才能为广大电视观众奉献出那么多动人的作品吧！

黄允为我们沏茶、倒水、削水果，忙进忙出。我们请她不要忙碌。她一边说着“没关系”，一边移电扇、开空调。趁此间隙，我们环视四周。屋子装潢质朴，简洁明快，家具都有些年份了，最显眼的是摆满书籍的书架，让满屋子透出浓浓的书卷气，也透出几分亲切安宁的舒适感，正像黄允本身给人的感觉一样。

黄允所住的公寓，是一幢建于20世纪80年代的高层建筑。其实，黄允完全可以换一套更好更大的房子，但她却始终没有离开这里，其中的原因，除了一生从不看重物质财富，还因为这幢楼属于“文革”后上海市政府给高级知识分子落实政策所

盖，而作为上海广电系统最初的开拓者中的一员，黄允对之有着深深的情结。

而我们的访谈也就在这样的话题中开始了。

作者：作为一个剧作家，您的文学创作的成就主要是在电视剧领域，那您整个的文学生涯应该从什么时候开始算起呢？

黄允：从我上小学开始，当我的作文本上出现老师赞扬的评语，我知道自己爱上了写作。像小学里写的《雷雨》、《一朵折断了的花》，还有考女师时的应试作文《女师校景一瞥》，这些小小的文章都是半个多世纪前的，但我仍然记得，也许我对文字有一种天生的敏感吧。

后来，我虽然非常想从事文学创作，但一直没有机会。我也想过写长篇小说，但可能我一直在广电系统工作吧，对声音、对影像耳闻目染，所以觉得文字似乎还不足以表达自己。在我生命的前四十年里，可以说，我一直没有找到最合适自己的文学写作样式。说起来，我文学事业方面真正意义上的起点是在我已经过了不惑之年之后。所以，我特别感谢改革开放促成的我国电视事业突飞猛进的发展，特别感谢由此带来的电视剧这一新兴艺术的崛起。当我和电视剧相遇之后，我觉得我终于找到了最适合自己的文学创作样式，遇到了发展自己的文学事业的机会，同时也因此感受到了自身的价值。如果问我的文学生涯从什么时候开始算起，从严格意义上讲，应该是我开始从事电视剧编剧开始的。

作者：在您的文学创作过程中，对您帮助最大的是什么？

黄允：我没有上过多少学，在编剧专业上，我也没有导师。但我却酷爱读书，我自修了大学中文系的课程，即使在“文革”中也没有中断过，我读了大量中外文学名著。可以说，书就是我的导师和挚友了。是书籍，使我拥有了一个宽广的内心世界，为我打下了文学写作的基础，也使我的心一直很年轻。我从书中认识了许多令我钦佩的人，使我不知不觉接受了他们的熏陶。比如鲁迅先生，我是将他当成自己的精神导师的，他的“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也成为我的人生座右铭。巴金的《家》也激发了我积极向上的热情，向往革命，走出家庭。现在，我已年逾古稀，但书籍仍然是我的导师和朋友。我的学习方法是缺什么补什么，用什么学什么。书籍能把人带入一个博大的世界，文学名著能丰富人的心灵，陶冶人的品性。当然，科技进步了，媒体多样化了，电视、电脑都有很强的优势，几乎改变了人们的生活习惯、思维方式，但我觉得，却仍然代替不了读书。比如，读过文学名著了，再看根据其改编的影视剧，即使拍得不错，总还会感到一些不满足，不够味儿，那就是因为文学留给了读者更多想象的空间，书中的人物、场景在你脑海中呈

现时，已经加入了你的想象，你已经参与了创作。而影视剧太具体、太形象，观众可能只要舒舒服服地去接受就是了。我常常想，如果就此而不再读书了，人会不会变得简单肤浅了呢？

作者：书籍是您的精神导师，请问您最喜爱或者说影响过您的文学作品是哪篇？

黄允：鲁迅的不少作品都曾经深深地影响了我。我也很喜欢英国的文学名著《简爱》。最近，我翻阅了自己几十年来保存下来的笔记本，看到其中好几本里反复抄录过这样一首诗：

你抓不到天上的星星
你不要说你抓不到希望
你摘下路边的小花儿
你不要说你已经摘到了希望
你的希望在无穷的路头
你不要说你的希望太遥远
你必须走完这条路
你不要说太困苦艰难
不要说太困苦艰难

我记不清这首诗的来源了，但我非常喜欢，它跟随了我几十年。也许这首诗算不得上品，但它真的激励过我的人生：成功时不骄不躁不停步，每一部作品都是从零开始；遇到挫折时，无论是唾沫、拳头，还是阴损，就独自在路边的小树上靠一靠，包扎好伤口，擦掉污秽血迹继续前进。正因为如此，我才会坚持不懈，才会有一部部电视剧作的问世。

这首诗，我偶尔也会在公众场合朗诵。印象最深的一次，是在1991年召开的全局大会上，那次大会有近千人参加，在国务院颁发的突出贡献特殊津贴享受者名单中，上海文艺界首批十一人，有黄佐临、柯灵、谢晋等。他们都是大师级的人物，我也忝列其中，我自己觉得和他们相比不在一个层面上，大概我代表的是电视界，而电视是个新兴的艺术和产业，所以我也跟着得到了特殊待遇吧。那次大会，当时的市委宣传部部长金炳华、广电局局长龚学平都出席了。在这个大会上，我朗诵了这首诗。会后，朋友们都说这首诗好，还有不少朋友来抄录这首诗呢。

作者：您在电视荧屏上成功塑造了很多女性形象，她们各不相同，无论是早期的张志新，还是后来的李若男，但都是有血有肉，活生生的。有评论家说，您在作品中注入了独特的女性意识。请您谈谈您自己的女性意识吧。

黄允：我一直觉得自己没有什么特别自觉的女性意识，写作对于我来说，只是一种自然的流露，一种心灵的呼唤。如果说有什么女性意识，那就像美国女诗人阿德里安娜·里奇所说的，是一种“自古以来，就在妇女群中天然形成的认同感”吧。

1995年，在世界妇代会举行期间，北京电影学院戏剧文学系的夏汉碧老师在“中外女性国际文学学术研讨会”上发表了一篇论文，题目是《女性文化的认同——从作品看黄允的女性意识》；前几年，北京广播学院研究生崔莉的硕士论文《论黄允剧作的价值取向》，其中也用很大的篇幅论述我剧作中女性形象的审美理想。她们的论述对我很有启发，促使我回顾这几十年来自己的剧作，的确大部分是以女性为主体的，角度也大多是从家庭来辐射社会的。

或许这和我的性别以及小时候的境遇有关。我出生在重男轻女的家庭里，小时候每当被歧视，我就会在心里默默发誓：我长大了一定不会比男孩差。我十几岁就独自离家，开始了一个人的奋斗人生。电视剧《上海一家人》播出时，《北京晚报》载文说：“黄允就是小若男。”我虽没有小若男的经历，却有跟她相似的心态。由于较强的潜在的女性意识，我对女性的命运、心灵、价值观和幸福观都特别敏感和关注。我非常欣赏女性的人性美，总感觉女人比男人更坚韧，更具有献身精神。女人可以为家庭、为孩子、为爱情全身心地付出，而男人却往往是有条件的；女人的心灵更为细腻、丰富、敏感、善良，这个世界因为有了女人才更加美丽、温馨。当然，女性的人性中也有弱点和丑陋，比如依附性、嫉妒心、虚荣心、小心眼、感情脆弱等等。有些女人的一生就是搅在是是非非之中，对别人的成功、快乐、美貌，对别人的一切都愤愤不平，结果弄得自己很不快乐，心境差了，奋斗的意愿肯定也不足了，最终便一事无成。我每部作品里的女性形象都是随着社会的进程，随着我当时内心的审美理想、价值追求，甚至困惑等的变化而形成的。

作者：您的作品大多描写婚姻、情感和家庭，其中最主要的元素就是爱情。写过那么多悲欢离合，作为一个女性剧作家，您是怎么看待爱情的呢？

黄允：对于爱情的态度，这么多年来我一直没有改变过：我相信爱情，但也相信它并不是永恒的。也许，这就是人性的大悲哀。人非圣贤，但即使是圣贤不也有过爱情的漂移吗？这种不确定性进入家庭后，往往便会导致所谓的婚外恋。

所以说，婚外恋情并不是现在才有的，其实每代人都会遇到，只是过去不被承认，被故意掩盖或者抹煞了。爱情压抑、异化的结果是使许多夫妻关系僵化，许多家庭成了禁锢的牢笼。这个问题如今变得更加突出了，可能是因为现在这个时代，人的社交面空前广阔，情感世界的波动频率更高了。我在想，是否有必要把每一次似深还浅、来去飘忽的情感冲动都定性为婚外恋呢？这是有待商榷的。另外，我觉得那种吃“爱情快餐”的生活态度，会使现代人的情感世界日益粗糙，这是最大的代价。

作者：有些剧作家写出一部很轰动的作品后，就很难再有能超越自己的作品了，而您恰恰不是这样，在您的文学生涯中，创作高峰迭起，可谓一浪高过一浪。您自己认为是什么原因呢？听说您有一个自己特殊的“空间”，是这样吗？

黄允：杂技演员走钢丝，不是抱头缩颈，而是要尽力伸展手臂。道理很简单，有空间才会有自我调节的余地，才会达到平衡。创作是这样，其实，做人也是这样。

我自己有三个层次的生活空间。内层是心灵，是自我，它比较孤独、静思，但它决不刻薄——刻薄是把双刃剑，伤人也自虐，对于女性，自虐尤甚。第二层是家庭，是丈夫，是女儿，它给我宁静、宽容，是温暖的避风港；同时，小家庭中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个人空间，应该彼此相互尊重，更应付出真爱和关心。第三层是朋友，我和许多采访对象结成了知己，通过他们，我一次次地拓宽了自己对生活的认识和理解，从而使心灵不断保持成长的年轻的状态。我还有一条人生的主干道，那就是用实力、用作品来证明自己，不卷入无谓的人事纷争中去。有些女人为此虚掷一生，太可惜了。

说到作品的超越，我想说，最最根本的原因是思考，这种思考既是跟随时代变化的，更是站在时代前沿的。只有这样的思考，才会使作品有思想的价值，有思想的力度，这是文学作品真正有生命力的地方。

作者：您刚才说内层的自我是孤独而静思的，请问这怎么理解？

黄允：是这样的，我笔下的人物中，无论多么要强的女人都希望有个肩膀靠一下，撑一把，但我内心又深深地知道，一个人如果把一切都寄托在另一个人身上，无论这个人是爱人还是亲人，最终很可能失落多过获得，烦恼多于快乐。因此，我一贯主张要一步一个脚印地走自己的路。

这也许是和我自己的生活经历有关吧。我出生在一个多子女的家庭，又是女孩中的丑小鸭，从来没有被宠爱过、重视过。幼年的时候，我常常一个人在门槛上坐

半天，看着天空中变幻的浮云出神。后来又逢战乱，全家人颠沛流离。有一段时间我被寄养在伯父家，一个人住在老宅里。白天，大人们都下田间劳动去了，我一个人呆着，晚上吃完饭后和亲戚们也说不上几句话，就回到房间，还是一个人，用被子蒙住头睡觉，其实也没有睡着，内心里自己在和自己讲话。

有一天，我爬上凳子打开大橱，发现了一叠厚厚的《妇女》杂志，我当时认字不多，但连猜带编地把杂志看下来了。杂志里那些女性渴求解放的呼声，使年幼的我产生了激动和共鸣，有些小说中的细节我至今仍然记忆犹新。后来我回城上学，包括后来升入初中，有了图书馆，我几乎天天沉醉在书籍中。阅读是需要宁静的，也常常是自己一个人，这就是我说的孤独静思吧。我十六岁离开家开始自己的生活，经历了很多事，但无论何时我都要给自己一个心灵的空间。我在进行创作的时候，即兴的火花多是在孤独的空间里悄悄地燃起的，寂静使我得以过滤生活。

作者：上海这座城市对您的创作带来了什么影响？

黄允：上海这座城市给了我很多，我不是上海人，但我在上海生活、工作的时间很长。我创作的《家事》、《上海一家人》、《若男和她的儿女们》，写的都是上海的故事，都有浓郁的上海气息。所以，一些研究者认为我是“海派文化”在电视剧创作领域的一个代表性人物。我一直认为我受着上海这座城市的很大的影响。我对上海的石库门里弄也有一种天生的亲近感。在我看来，真正的上海的精神、上海的文化之根是在弄堂里，在石库门里。上海独特的石库门文化孕育并滋养了上海近代文明，作为一种文化积淀，它包含着上海特色文化的基础——包容性、大众性。上海人对和谐、温馨的人际关系是十分向往的，虽然这种人际关系会因过于密集而使人觉得没有了隐私，但是，当人们失去这种紧密的人际关系后，倒会深深地怀念起来。正是这样的文化，使上海在变革、开放中海纳百川，同时得到了现实生活的回馈。同时，这种文化也深深地融合进人们的生活中，表现在上海人所具有的细腻、柔和、精明的性格特征中。这些都是我十分有兴趣去研究和表现的，我也把自己的所思所感所悟融进了自己的作品里。另外，上海也是我国电视事业起步最早的城市之一，先进的技术、理念，这对我的电视剧创作无疑也提供了最好的条件。

说起我的成长，我的作品能一部部面世，这与上海市领导的关怀和支持当然是分不开的。我的创作适逢电视剧刚刚兴起的时候，要是没有上海电视台、上海市广电局和上海市委、市政府领导对电视剧创作的高度重视和支持，怕是很难有在全国产生巨大影响力的作品的，更不会有全国电视剧生产重镇的地位。我写的

《上海一家人》，如果没有当时上海电视台台长龚学平的支持，不知何时才能和观众见面。我写的《她在人流中》播出后，当时的市委副书记曾庆红、宣传部副部长孙刚亲自召开了一次座谈会。我在写《若男和她的儿女们》时，当时的市委副书记陈至立审看了剧本，并且约见了我，提出了宝贵的意见和建议，并明确同意开拍。当时的市委宣传部副部长、文艺理论家徐俊西看了剧本后也约见了我们。现在的市委、市政府的领导也一直关心着我的创作和生活。我内心里非常感谢上海。

作者：您的作品被誉为“只只响”，在外人看来，您的文学创作道路走得一帆风顺。果真是这样的吗？

黄允：不，不是这样的。说实话，不但不像外界看来的那么顺利，而且可以说坎坷颇多。电视剧是一门综合性艺术，不像写纯文字的文学作品，若要拍出来，靠编剧一个人是不行的，还涉及到投资和发行，还要有导演和演员的二度创作，牵涉到的问题很多。所以，一部电视剧真正要和观众见面是非常不容易的。

比如说，《他把希望留下了》写的是上海的故事，人物的原型也在上海，我还去了上海船厂下生活，但因为种种原因，最后是由大连方面拍的。比如，《家事》由于没有写英雄人物，而是写了在那个时代觉得上不了台面的家长里短，最初也不被认可，被搁浅了一年多。

还比如，《故土》是根据苏叔阳的长篇小说改编的，但当时在改编成电视剧时受到了很多非议，有人说“这里有四角恋爱”、“男主角白天明不像改革派”、“女主角叶倩如歪曲了现代青年形象”等等，还有人通过各种渠道来阻止。又比如，大家熟悉的《上海一家人》，最初也不被看好，没人愿意投资。当时如果我写企业，还可以让企业赞助，但我偏偏写的是普通百姓，拍摄的钱问谁去要呢？所以我常常拿着剧本去“游说”，而这是我不愿意干的事，但是为了我的作品——它们都像我的孩子一样，能够和观众见面，我也豁出去了。

我还有一个比较大的遗憾，那就是我的剧作《忽然做了都市人》（又名《浦东一家人》）一直没能投拍。1999年，我受上海浦东开放开发巨大成就的鼓舞，开始撰写这一长篇电视连续剧剧本。为写作这个剧本，我从1998年6月起就去浦东下生活。剧本通过浦东菜农蔡阿根一家人六年多来的变化，勾勒了浦东开放开发时期的一个侧面，展现了大变革时代的浦东风貌。剧本完成后，有几位导演主动要求拍摄，最后和上海永乐影视公司签订了合同。但因经费问题迟迟未能拍摄，后来连公司也撤销了。我曾和几家摄制单位联系过，有的已谈成，但因领导层人事变动搁浅，有的因在操作方式上不合适，我怕影响拍摄质量和风格，觉得还是保留完整的

剧本，保留一幅浦东开发开放的生活画卷为好。我愿意坚守自己的人生追求，没有拍摄虽然是有些遗憾，但人生总有取舍。

我自己知道，我的电视剧剧作也并不是个个都是上佳水准，有的作品或者内涵还不深刻，有的则没有在中央电视台播出，所以像《流逝的岁月》、《欲念与惩罚》、《罪犯与女儿》等，社会影响力就并不大。

作者：党中央非常强调文艺创作的“三贴近”原则，您是怎么理解，在实践中又是怎么做的呢？

黄允：“三贴近”原则是要求文艺创作“贴近现实、贴近生活、贴近群众”。我觉得一部好的文艺作品，它必然是和现实紧密相连的，和生活息息相关的，既能反映群众的呼声和疾苦，同时又是群众喜闻乐见的。我一直相信艺术来源于生活，再阳春白雪的作品，如果脱离现实，脱离生活，观众就不会接受，就是一种浪费。我觉得“三贴近”原则不是喊口号，是实实在在对文艺创作有教益的。说实话，我的那些获得广大观众朋友厚爱的作品，没有一部是脱离现实、脱离生活、脱离群众的，正因为如此，才能获得观众最大的共鸣。而在实践中，我每写一部作品，都自觉地下生活。我心里非常清楚，要是我没有按张志新最后的生命之路走一遍，我是绝对写不出她就义时的凛然正气，因而不会在社会上产生那么大的震撼力的；同样，要是我不下里弄，不去石库门体验生活，不和平民百姓交朋友，我也是绝对写不出《上海一家人》的。下生活既是我的自觉要求，也是我自己创作的必然要求，必须沉到生活中去，必须对生活有自己的发现，不然我肯定会心里没底的。对于我来说，下生活不仅仅是去搜集创作素材，更是唤起自己的创作激情和自信。我不相信闭门造车的东西会有真实而长久的生命力。另外，作为大众艺术的电视剧，我认为更要心系观众，心里一定要想着、装着观众，不然，观众就会抛弃你。

作者：您的艺术追求具体说来是什么？

黄允：我主要从事电视剧剧本创作。电视剧是一种新的艺术品种，它通过电视技术这个载体，使你的作品传播到天涯海角，使你塑造的人物一夜之间家喻户晓，这是现代科学的一个奇迹。我深深地感到，作为电视剧创作者，应该努力地掌握、驾驭电视技术。经过实践，我给自己寻找到一个交叉点，那就是：必须拥有观众，但也不失落自己。要把自己的作品定位在这个交叉点上。我常常是采用双层结构：表层有一个可看的故事，一般观众都能观赏。内层有可咀嚼的东西，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以求雅俗共赏。我希望自己的作品能深入人的内心世界，揭示人的内心世

界，把人人都能碰到、见到、听到，或者亲身经历过，或者潜意识中存在过，而又没有在意的东西，把它提炼出来，再通过屏幕展现在人们面前，使人们产生一种激动、联想、感悟和共鸣，从而重新审视自己。这是我的艺术追求。

作者：作为电视艺术的前辈，您最想对年轻的电视剧创作者说些什么？

黄允：现在的电视剧创作者有着非常好的环境和机遇，比我们当年要有利很多。电视剧是艺术和现代科技相结合的产物，是目前受众最多、影响最大的艺术样式，这是令人庆幸的，但同时也是令人敬畏的，这是一份值得电视剧创作者用心灵和生命去投入的事业。

因为电视剧属于大众文化，所以，电视剧创作者更要深入现实生活，生活总是创作的源泉，生活不仅提供了创作的素材，更重要的是能在生活中和平凡百姓心灵相通，对生活有所发现，有所感悟，激发起创作的激情。但是，也不能一味迎合、讨好观众，不能走低俗化、庸俗化的路子，要有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在市场经济中，电视剧是商品，但剧作家不能太商品化，要在各种诱惑中守住自己，守住基本的职业底线，要懂得放弃点什么，但要坚持人文情怀。写作和经商毕竟不一样，如果把利益得失计较得太重，就会失去灵气和真诚。

作者：作为一个成功的剧作家，一个成功的女性，您有什么人生感悟和大家分享吗？

黄允：现在对于“成功”的定义各不相同，我也不知道自己是否符合目前社会流行意义上的“成功”。不过作为一个有了一定年纪的人，人生的感悟是有的。我觉得无论社会怎样发展，经济怎样发达，科技如何进步，物质如何丰富，人与人之间的爱与善，永远是最美丽、最珍贵、最有力量的。

有追求的人，生活的路不会很平坦：有艰辛、有风险、有失落、有磨难、有伤痛，然而也会有成功的喜悦、心灵的充实和生命的重量感。成功的要素是：智商加机遇加坚韧，我认为坚韧是第一位的；智商再高，一击就垮，不行；有了机遇，不会正确运用，也会失去；只有坚韧的精神，可以使人孜孜不倦地学习，获得才智；可以百折不挠地捕捉、等待机遇。

成功的人必然是出色的。“木秀于林，风必摧之”这是常见到的。生活在群体里，周围有几双嫉恨的眼睛盯着你，叽叽喳喳的闲话跟着你，也是很不好受的。可如果因此而什么也不敢做，就会失去自己。我想，人还是应该走自己的路，不要太在乎那些闲言碎语。当然，对周围的人要热情、真诚，肯帮助别人，肯承认别人，那多数人是会理解你的。

此外，换位思考是很有益处的。一般来说，女性思维比较感性、比较自我。而当我写剧本时，剧中各式各样人物要自己出场，按照他们自己的思维去言行，此时作者是没有自我抒发的空间的。为了使剧中人物鲜活贴切，作者必须学会换位思考，挖掘他们存在的理由，即使对平时厌恶的角色，也要设身处地去想想。经过久而久之的训练，我感到在现实生活中，也就比较容易理解别人，内心也会比较宽容和平衡了。

作者：您和您女儿的通信非常有意思，其他人看了也很有启迪，能不能谈谈这些信和您的感受？

黄允：我女儿大学一毕业就一个人去国外闯荡了。这些家书，原来是没有准备发表的。写信的时候，碰到什么谈什么，想到什么写什么。信中涉及的内容很广：人生、社会、爱情、友谊、学习、打工、艺术创作、风光、习俗，乃至服饰审美、东西方饮食文化等等。女儿详尽地描述她在法国的一切，是希望让我们像真的一样和她一起在法国生活；而我，也在繁忙的工作之余，或者夜深人静的时候，尽情地和她在纸上聊天，就像她还在身边。这种感觉和意境是通电话无法代替的。当然，国际长途也太昂贵了，于是不知不觉在三年里有了七十几封书信。朋友们知道了这些信的内容，都很感兴趣。上海人民出版社的吉传仁先生、《电视·电影·文学》杂志的桂未明女士等朋友也都希望拿去发表、出书。我和女儿在信中商量了一下，觉得能和更多的朋友一起谈心，向他们敞开心扉，未尝不是好事，我们相信人们是会接受一颗真诚的心的。

作者：您现在每天都做些什么呢？

黄允：我的生活还是很有规律的。每天早上我会锻炼半小时，先慢跑，再做操，保持适量的运动对老年人是需要的，但切记不可过量，过犹不及。我现在仍然把大量的时间用来阅读，每天看很多的报纸杂志。晚上的时间，我通常用来看看电视，一是休息放松，二来也是学习，我毕竟是做电视出身的，挺想知道新一代的导演、编剧都在想些什么，用什么样的艺术手法来表现他们想表现的。此外，我还会收到大量的会议通知，我都会量力而行，包括接受采访一类的。平时，还常会有一些约稿，我还是会写一些文章，出些书籍，整理回忆录。每一天，都还算充实。

作者：2009年9月18日，您参加了第27届中国电视剧飞天奖颁奖典礼，并获得了“60年60人突出贡献奖”，当时您最大的欣慰是什么？

黄允：我参加过几次飞天奖的颁奖典礼，但感觉这次是最盛大最隆重的，在新

中国六十华诞的时候，我能获此殊荣真的觉得很荣幸。这是我一生中获得的最重要的奖杯，也算是我编剧生涯的一个圆满的句号。我最大的欣慰，是知道如今中国电视剧年产量已达到一万四千多部（集），成为世界上电视剧第一大国，想当年中国电视事业起步时几乎是一穷二白，而经过几代人的努力，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辉煌成就。我另一个最大的欣慰，是看到了中青年群星璀璨、精英云集，真是后浪推前浪，中国的电视剧事业新人辈出、后继有人，充满了希望。